

清代学者整理宋元方志文献成就考

Study of Literature Achievement about Song and Yuan Dynasty Local Records
Arranged by Scholars in Qing Dynasty

刁德林

Diao Delin

故宫博物院
Journal of Qing Dynasty Studies 2014 Vol.12
故宫学刊
二〇一四年 第十二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Palace Museum Publishing House

清代学者整理宋元方志文献成就考

Study of Literature Achievement about Song and Yuan Dynasty Local Records Arranged by Scholars in Qing Dynasty

刁美林

Diao Meilin

内容提要：

宋元方志在中国方志学史、文献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代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集大成时期，许多名学大儒对宋元方志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在辑佚、编纂、刻印、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考证、评论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值得深入研究。本文着眼于保存传承、整理研究、价值认识三个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领域，对其进行梳理、总结和概括，借以管窥清代方志学、文献学的发展及成就。

关键词：

清代学者 宋元方志文献 保存传承 整理研究

ABSTRACT:

Song dynasty (960-1279) and Yuan dynasty (1271-1368) local records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orography and bibliography. Qing dynasty (1644-1911) is a brilliant period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cademic integrated. Many famous scholars have systematically arranged and researched the Song and Yuan local records, and have gotten great achievements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recollection, compilation, engraving, directory, version, collation, distinguishing, research, and comment, all of which are worth further stud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inheritance, arrangement and research and value understanding, three fields which have greatest achievements and most profound impact, to sort, summarize and generalize the 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s of chorography and bibliography in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scholars in Qing Dynasty, Song Yuan local records, preservation and inheritance, arrangement and research

我国地方志的历史源远流长。自春秋战国时起,我国地方志发展经历了地记、图经和定型方志三个发展阶段。宋元时期是我国地方志发展的成熟期,在此期间,地方志体例基本定型,内容亦趋完备。宋元方志虽数量较少,但质量较高,其体例结构完整,编纂方式简明,为后世所继承。

清代则是我国地方志书编纂的繁荣期,也是方志学发展的极盛期。一方面,清廷重视修志超乎于前朝,自顺治十八年起,就多次命令各地督抚纂修方志,以备编纂《大清一统志》采择,雍正朝更是确立了各州、县志每六十年一修的制度,形成浓厚的官修志书风气。《大清一统志》的三次递修,与全国各地省、府、州、县檄修郡邑志,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局面,成为牵动全国的大型官方文化活动。以毕沅、阮元等乾嘉考据学者为代表的清代地方长官,亦常常招聘钱大昕、孙星衍等厚学能文之士,领衔纂修方志,并以此标榜儒雅,争相斗文。另一方面,到了乾隆中后期,国家政治稳定,封建经济繁荣,高宗号召天下士子“究心经学,以为明道经世之本”¹,兴起“笃志研经,敦崇实学”²的稽古之风。同时,以乾隆八年杭世骏因议“内满而外汉”而被革职为肇始,高宗大张文网,发起孙家淦奏稿案、王肇基献诗案等文字冤案,宣告文化桎梏时代的来临。清代知识分子的学术兴趣被迫转移,终日寝于音韵、训诂、小学、金石等“实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古学复兴。在此乾嘉学术兴起的大背景下,许多名学大儒发心整理乡邦文献,大规模网罗遗佚,保存传承历史典籍,尤其是以整理具有重要价值的宋元旧志为职事,取得极大成就。

迄今为止,与此论题相关的一些代表性学术研究成果,较早如著名学者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³一文,重点对清代学者纂修地方志的成果以及清代方志学的勃兴与发展进行论述,基本未涉及宋元方志。巴兆祥《陆心源所藏方志流失日本考》⁴一文,对晚清著名藏书家陆心源收藏中国古代地方志的源流、数量及其藏志被日本静嘉堂收购的过程等进行了详细考证,这其中就包含了六百余种宋元方志。周生春《四库宋代方志提要补正》⁵、《〈四库全书总目〉宋代方志提要补正》⁶两篇文章对《四库全书总目》地理类所录之(嘉泰)《会稽志》、(淳熙)《三山志》等10种宋代著名方志从书名、作者、卷数、版刻流传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其他如邹帆、胡伟《论〈永乐大典〉的方志辑佚价值——以〈宋元方志丛刊〉中辑本为例》⁷一文,主要论述了明代大型类书《永乐大典》收录宋元方志时的辑佚成就,王雪玲《清儒整理唐代文献研究》⁸一书则是对清儒整理唐代文献的成就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是,以往的成果都未对清代学者整理宋元方志文献的成就进行全面系统研究。鉴于清代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集大成时期,许多名学大儒在对宋元方志文献的辑佚、编纂、刻印、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考证、评论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限于篇幅,本文着眼于保存传承、整理研究、价值认知三个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领域,对其进行梳理、总结和概括,借以管窥清代方志学、文献学的发展及成就。

1 《清高宗实录》卷七九,乾隆三十年十月辛丑条。

2 《清高宗实录》卷二八六,乾隆十二年三月丙申条。

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

4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5 《文献》1995年第2期。

6 《文史》第50辑,中华书局,2000年。

7 《群文天地》2011年第8期。

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一 保存传承宋元方志文献

对于宋元方志文献,清代学者非常重视,如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时,地方志收书之例,即为宋元方志全部收录,明则选择甚严,仅收五种,清则止收当时之省志。但卷帙浩大的宋元方志大多已经失传,尤其是宋朝300多年间,有名目可考的地方志约1031种,而留存于世者却仅29种500余卷¹,这其中还包括了相当一部分残缺不全者,给后人研究利用带来较大的困难。因此,充分利用存世文献如《永乐大典》等,从中辑出部分宋元方志,并尽力搜访稀见版藏,比对补充,抄录刻印,以广流播,便成为大多数清代学者整理宋元方志时的首要任务。例如,著名方志学家缪荃孙就曾为元(至元)《嘉禾志》残本的搜逸辑补工作煞费苦心:

此书止有传抄,中多残缺。荃孙先得上海徐紫珊旧抄本,李升来年丈校以罟里瞿氏藏本,虽有佳字,残缺正同。上海市中复过录海宁管芷湘庭芬校本,芷湘据桐乡冯孟亭浩、嘉兴沈双湖叔埏、张叔未廷济、戴松门光曾、秀水章益齐全、钱味根聚仁六家本汇校,并据赵《府志》、《松府志》、崇德《海盐志》补缀,虽伪字甚多,而实有裨益。如嘉兴路毛家桥下,本接乌盆桥,今据戴本以环聚堂之五十六行移正。《显济庙记》脱一叶,据章本补之。朱行先志、刘深志,据《漱水续志》补之。《桥道记》缺一叶,从李昌龄《乐善录》补之。《州学大鼎考》,据戴本补之,均有来历可以据依²。

南宋施谔所撰(淳祐)《临安志》,备载南宋数朝掌故,可补史传之遗。据《永乐大典》卷七六〇三《杭州府志》记载,此志“为门者十有二,为类者九十有九,为卷者五十有二,总之数十万言”³,麟麟炳炳,卷帙浩繁。而到清乾嘉时期著名学者阮元时,“仅存五卷至十卷,无序目可稽”⁴。残缺之严重,令人扼腕叹息。因此,除阮元有收录残本六卷外,清仁和人胡敬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文,分为十六卷,举封域、建置、沿革、疆域、城郭、山川、池塘、埂、桥梁、风俗等门,又各以县为次。光绪年间,藏书家丁丙得此抄本,又远道借录朱氏结一庐藏旧抄本,悉依补抄院及宫观二门,分为八卷,付之剞劂,名曰《(淳祐)〈临安志〉辑逸》⁵,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清人徐松自《永乐大典》中辑出《河南志》是另一件极具学术意义的事情。徐松字星伯,原籍浙江上虞,入籍大兴。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充全唐文馆、文颖馆提调总纂等。他“天性敦挚”“胸次宽博”“四方宿学之客京师者以是皆归之”⁶。徐松借修书之便,经眼了许多四库未见及宫藏珍本秘籍。除修成《全唐文》外,徐松还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中兴礼书》二十四本、《宋会要》五百卷、《河南志》四卷。尤其是《河南志》,其中保存了不少佚书中的资料,如《河南郡图经》,晋陆机、华延雱等人的《洛阳记》,唐韦述的《东京记》等,已成为后世治史者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此志四卷八目,对研究隋唐王室规制、城市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1 参见顾宏义:《宋朝方志考》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2 (清)缪荃孙:《(至元)〈嘉禾志〉跋》,(元)徐硕《嘉禾志》,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本。

3 (宋)陈仁玉:《(永乐)〈杭州府志〉·陈仁玉序》,(明)解缙等《永乐大典》卷七六〇三,中华书局,1986年。

4 (清)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研经堂外集》卷四,商务印书馆,1955年。

5 参见(清)丁丙:《(淳祐)〈临安志〉辑逸跋》,(清)胡敬辑《(淳祐)〈临安志〉辑逸》,清光绪二十六年《武林掌故丛编》本。

6 (清)徐珂:《清稗类钞选·著述类》,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

义。正如清人沈垚论此志曰：“今宋氏《长安志》虽存，而坊市伪缺，《河南志》久佚，独借此志而隋唐东都制度犹可考见其全，其当宝贵何如也！”¹

辑佚者的功劳是巨大的，而抄录、刻印者的努力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有较高价值的文献典籍，若得不到及时的抄录、刻印、流播，最终结局也只能是典故坠失，湮没不彰。在这方面，清代学者的所作所为称得上是无可挑剔。缪荃孙就曾这样描述自己访寻、抄录元《河南志》的情形：

一日，见《河南志》抄本一巨帙，无卷数，用《全唐文》格子，封面题《河南志》，识是徐星伯先生手笔，城池宫阙，自周至唐悉具，知是宋次道《河南志》之首册，而星伯先生修《全唐文》时所录者。议价不成，次日即为人购去，懊恼欲绝。后探知归常熟师所，因乞归录副，而细校之²。

再如南宋张津所撰（乾道）《四明图经》十二卷，被明人郑真编入《四明文献集》。清代文学家全祖望在宁波天一阁偶然发现此志后，如获至珍，“为之狂喜，乃别为抄而出之。于是，扬之小玲珑山馆马氏、杭之小山堂赵氏皆来借抄”³。扬州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之小玲珑山馆与杭州赵昱、赵信兄弟之小山堂，都是清代著名的藏书之所。尤其是马氏小玲珑山馆之丛书楼，以藏书十万卷极负美名。清李斗《扬州画舫录》述其“藏书百橱”⁴。赵氏兄弟之小山堂，藏书亦达数万卷之多，人称“谷林小山堂图籍埒于秘省”⁵，即谓其藏书量可与政府相比。仅以地方志而言，小山堂除拥有宋版（开禧）、（宝庆）《四明志》而外，明成化以前的各类方志亦有千余种。除了藏书，小玲珑山馆与小山堂亦以刻书出名。小玲珑山馆所刻之书，细腻精美，独具特色，世称“马版”。小山堂刻书风气如一，雅趣流溢，绝无俗态。

一部（乾道）《四明图经》，引得全祖望、马氏、赵氏等时人名士与刻书机构接踵而至，抄录副本，付梓流传，足见清代学者对宋元方志文献之高度重视。

二 整理研究宋元方志文献

方志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献资料，有存史、资治、教化的社会功用。然而，由于受到经费、人员、流传等多方面原因的影响，编纂质量也存在着诸多不足。清代经学大师毛奇龄就曾较为详细、系统地论述了地方志书存在的多方面问题：

天下事有不可信者三，而郡县志居其一。夫摭袭前志，罗列文书，分类而彙载之，一书吏足矣。援据失实而是非不公，宜其不足信也。古人谓，志通乎史，才、学、识三者俱难，是固然矣，余更

1（清）沈垚：《与徐星伯中书论〈河南志〉书》，《落帆楼文遗稿》卷一，民国贵池刘氏《聚学轩丛书》本。

2（清）缪荃孙：《元〈河南志〉跋》，转引自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三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3（清）全祖望：《鮑琦亭集外编》卷三五，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4（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四，中华书局，1960年。

5（清）翟晴江：《东皋诗序》，（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

推举纂辑之病有数端焉。古今郡邑同名异地，遥立侨置，脱漏舛讹，登所当汰，弃所当取，其病一也；录用故实，不详典记，读者茫昧，无缘指疵，转相传引，遂成谬种，其病二也；排比职官，备列名位，阶秩错紊，年代混淆，其病三也；节烈递增，登录宜备，羌无规格，累牍复重，其病四也；统编艺文，不择佳恶，势驱情徇，录取冗繁，其病五也；著事奋笔，不采舆论，褒贬失真，白黑倒置，其病六也¹。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总结中国古代方志学之成绩时亦说：“方志中什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众修，位置冗员，钞撮陈案，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²因此，对存有诸多问题的宋元方志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便成为许多清代学者非常重视的课题。如关于徐松辑自《永乐大典》的《河南志》，究竟是源自宋敏求的《河南志》二十卷，还是由元人纂修而成，自成书之日起，学术界就有着颇多争议。清人沈垚与徐松同为嘉道时期中国舆地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二人一向过从甚密。徐松自《永乐大典》中辑出《河南志》一书，自然引起好友沈垚的极大关注。沈垚《落帆楼集》卷四有《与徐松论〈河南志〉书》文，详细辨析与阐述了自己对《河南志》的内容传承与成书过程的认识：

河南府治宣范坊，在定鼎门街东，当东城之南。……至金正大初，改河南为中京金昌府，但据故东城而略展其东偏，于是府廨始移在东城区中，而故官城、皇城及京城，皆弃为城外地。元因金城而改曰河南府路。今是志言：隋皇城在府治城西二里。惟府治移处故东城区中，故皇城在府城之西，若府仍治洛水之南，当曰皇城在西北，不能言治西二里。又言：定鼎门在府城南一十里，建春门在府城东南一十里。屡言府城，又每言河南府路，则为元人书无疑。……盖其时敏求书具在，故官殿、坊市尽录原文，而略加金、元事一二条³。

沈垚通过对《河南志》记述的都城、宫殿、坊市等的地理方位、称谓的变化差异进行比对考证后认为，徐松辑录之《河南志》文本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另起炉灶、创帙成书，而是元人在宋敏求《河南志》原本的基础上，增入部分金元事迹，加以补充、完善、扩编而成。对此，晚清学者胡玉缙颇为赞同：“当以沈语为得。”⁴胡氏进而指出，韦述之《东京记》与《西京记》是宋敏求《河南志》的最初文本，在经过宋敏求的增补、扩编之后，规模衍为数倍，并成为徐松、阮元、缪荃孙等人抄录、刻印时所“摹从”的版本：

考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宋敏求《河南志》云：“以韦述《东》、《西京记》为未备，演之为《长安》、《河南》志。”今《河南志》不传，而此志于京城修文坊下云：“唐显庆改名弘道，国初避庙讳，复曰修文。”盖仍敏求原文也。……其本亦久佚，仅见于《永乐大典》，嘉庆己巳徐松修《全唐文》时录出。

1 (清)恩锡：《〈同治〉〈徐州府志〉序》，(清)朱圻等修、方骏谟等纂：《徐州府志》，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35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

3 (清)沈垚：《与徐松论〈河南志〉书》，《落帆楼集》卷四，转引自《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三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4 (清)胡玉缙：《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续编》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光绪戊申，缪氏始刊入《藕香零拾》中。……阮氏刊入《文选楼丛书》者……实摹从此志¹。

实际上，中国古代纂修地方志，在承袭前志的基础上而又补入新近事迹成书，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清代史学家钱大昕在考证所持有之南宋胡榘、方万里等撰二十一卷本（宝庆）《四明志》时就云：“志修于宝庆，而卷内叙事往往及绍定、端平、嘉熙、淳祐、宝祐，盖后人次第增入，非宝庆原刻本。”² 缪荃孙通过对志书中地理称谓的考察，认为徐松辑录之《河南志》为元人所纂辑，并对徐松辑录《河南志》时详宋略元的原因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至述元时，寥寥数语，必是星伯先生止录宋志，元代事则置之耳。”³ 而胡玉缙则完全不赞同缪荃孙的观点，认为缪氏“不知元代亦载东、西城坊，不过下有缺文，未必松略之也”⁴。

许多存世方志的撰者与成书时间不明确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因而清代学者对于这方面问题的考证用力甚深。如关于南宋（嘉定）《镇江志》的撰者与成书时间，阮元考证曰：

此书中称“宪”者四条，称“卢宪”者一条，故知是宪之书。书中所载事迹，惟史弥坚最详，赵善湘次之。考弥坚以嘉定六年九月守镇江，八年九月请祠。善湘以嘉定十四年十二月守镇江，十七年召还，宝庆二年再任。案元（至顺）《镇江志·学校门》载教官卢宪嘉定癸酉谒庙事。癸酉为嘉定六年，正弥坚守郡之日，书当成于此时也⁵。

元（至正）《长安志图》是元人李好问编纂的中国西北地区比较重要的地方志，对研究古都长安的历史地理有较大参考价值。关于《长安志图》三卷的具体成书时间，清乾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藏书家曾钊有《长安志跋》云：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元史本传》，称好问元年除国子祭酒，改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寻迁河东道廉访使，六年除侍讲学士，此书盖再任陕西时作。按下卷，有至正二年陕西行台监察御史樵隐必申达。而《泾渠图序》称前祭酒李公惟中，今为行御史台治书侍御史，每以抚字为念，尝刻泾水为图，集古今渠堰兴坏废置始末，与其法禁条例、田赋名数、民庶利病，合为一书，名之曰《泾渠图说》。据此，则此书实初任陕西时作，《提要》偶有未核耳”⁶。

元（至顺）《镇江志》是现存镇江古方志中较完整的一部。其体例虽多据南宋（嘉定）《镇江志》，但记事、考证远较宋志精密，对历代兴亡史事，记载详备。关于元（至顺）《镇江志》的撰者，清代著名经学家刘文

1 （清）胡玉缙：《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续编》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2 （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九，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

3 （清）缪荃孙：《元〈河南志〉跋》，转引自《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三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4 （清）胡玉缙：《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续编》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5 （清）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研经堂外集》卷四，商务印书馆，1955年。

6 （清）曾钊：《长安志跋》，转引自《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三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洪结合（乾隆）《镇江府志》与（嘉庆）《丹徒县志》考证后认为，“作至顺志者乃俞希鲁也”¹。刘文淇进而对宋元方志在流传过程当中的编次混乱不清、内容原本失真等问题进行了描述：

《直斋书录解題》载（嘉定）《镇江志》作三十卷，而抄本止二十二卷，盖原书久亡，后人由《永乐大典》录出，故卷数既有缺佚，而每书之总目、子目亦非其旧²。

伏读《钦定四库全书》，凡从《永乐大典》录出者，悉经删衍补脱，《京口耆旧传》陈升之、许畅、米友仁、邵饰、谭知柔、李珣等传案语或引（嘉定）《镇江志》，或引（至顺）《镇江志》，疑二书亦从《大典》中录出，馆臣曾见是书，而未经编定，故有宋志断烂而以元志补之者，有元志淆伪而以宋志入者，有子注而误为正文者，有子目而混为总类者，选楼校本及焦山校本已详言其误³。

清纪昀等在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曾将一部四卷本《无锡志》收录其中，由于此志不著撰人名氏，则关于此志的版本问题就产生了分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根据无锡“升县为州”的行政区划的变革，认为此志为明洪武年版，而并非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所著录之元王仁辅（至正）《无锡志》：“洪武二年四月始改无锡州为县，是志《古今郡县表》未虽止于升无锡县为州，然标题实称无锡县，已为明初之制……是洪武中书矣。”⁴对此，缪荃孙著《艺风藏书记》则辩称，此《无锡志》的类目正与《千顷堂书目》记载之（至正）《无锡志》“二十八数合”，当为同一版《无锡志》，并指出，出现差异的原因是后人在刻印时擅自进行了窜改所致：

《无锡县志》四卷，传抄本，元王仁辅撰。《无锡金匱志·流寓传》：王仁辅，字文友，巩昌人。……创修《（无锡）县志》，成二十八卷，《提要》因卷数不符，疑此书为明人所撰。按此书近编四卷，第一卷为《爵里》，第二卷为《山川》，第三卷为《事物》，分上、下二子卷，第四卷为《词章》，亦分上、中、下三子卷，子卷中又分小类二十一，合之正与二十八数合，而小类有不成卷者，疑撰《（千顷堂）书目》时据《县志》修入，卷数未核实也，至书名以“州”为“县”，系后人所追改⁵。

元杨諲撰（至正）《昆山郡志》是现存昆山地区最早的古方志之一，由于流传较少，具有极强的资料价值。此志卷帙，《传是楼书目》著录为二十二卷，而存世版本仅有六卷，且首尾完具。对此，阮元推测二十二卷本（至正）《昆山县志》曾遭删削：“惟铁崖序称二十二卷，今据书止六卷，首尾完具，岂成书之后，重为删定耶？”⁶钱大昕则质疑此二志并非同一部书：“铁崖《序》称二十二卷，今按之止六卷，首尾完具，岂铁崖所见乃别本邪？”⁷

1（清）刘文淇：《（至顺）〈镇江志〉校勘记》，（元）俞希鲁、（清）刘文淇等（至顺）《镇江志》二十一卷《附录》一卷《校勘记》二卷，清道光二十二年刊本。

2（清）刘文淇：《宋元〈镇江志〉校勘记序》，（元）俞希鲁等（至顺）《镇江志》，凤凰出版社，1999年。

3（清）刘文淇：《宋元〈镇江志〉校勘记序》，（元）俞希鲁等（至顺）《镇江志》，凤凰出版社，1999年。

4（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无锡县志〉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5（清）缪荃孙：《艺风藏书记》卷三，中华书局，2006年《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本。

6（清）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研经堂外集》卷四，商务印书馆，1955年。

7（清）钱大昕：《〈昆山郡志〉跋》，《潜研堂文集》卷二九，商务印书馆，1919年《四部丛刊初编》本。

对于钱大昕的推测,以考证群籍著称的常熟文献学家黄廷鉴不以为然,他在《校〈昆山郡志〉跋》文中全力阐明此六卷本《昆山郡志》实乃(至正)《昆山郡志》之残本:

地志首重建置、沿革、城池、乡都、桥梁、水利、户口、赋役、学校、官署、坛庙、祠宇诸大目,今皆缺而不载。且杨《叙》中明言昆山自县升州,地利日增,赋税甲天下州县,庸田水道利害所在,而志中绝不及之,其非完帙可知¹。

清代著名目录学家、藏书家周中孚更进一步指出,六卷本《昆山郡志》“记始于风俗而不及建置沿革,次又纪山而不及水”²,是后人在(至正)《昆山郡志》残本的基础上重新编次而成:“疑其全书缺佚,今所存乃残本,后人改卷数以就之,亦未可知也。”³

元于钦撰(至元)《齐乘》是山东现存最早的一部志书,修于至元五年,十一年刻梓,增《释音》一卷,共七卷,为历史名志,素被推崇。《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叙述简核而淹贯,在元代地志之中,最有古法”⁴。钱大昕在对《齐乘》考察后认为,该书在地理方位认定上存在错置现象:

古今地名,似同而异者多矣。……即以齐地言之,今之淄川,非汉菑川国;今之昌邑,非汉昌邑国,思容亦既知之矣。匡衡封乐安侯,本在临淮僮县,而思容以千乘之乐安当之,此亦千虑之一失也⁵。

宋元方志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难免发生散佚、分合、卷帙错乱或漫漶不完等情形,经过历代传抄刊刻后有时也会面目全非。因此,阮元等还非常注重对珍贵方志的版刻源流进行考证与记述:

(元至正《重修琴川志》)旧志创始于宋庆元间县令孙应时,至淳祐辛丑,鲍廉更加饰焉,旁搜博采,列为十门,而书乃详。其后时久人殊,卷帙散佚,百余年间未有取而续之者。元至正时,(卢)镇宰是地,乃属耆老顾德昭等搜求孙、鲍旧本,复参考异同,重付诸梓,凡所未载,并附卷末。书中云“晋案”者,惜佚其姓,疑德昭名也⁶。

当然,考证、校勘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对所从事人员的学术功底要求也相对较高。因此,清代学者在对宋元方志的考证、校勘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缺失。如对于元陈大震撰(大德)《南海县志》的研究,晚清藏书家潘宗周就认为《南海志》残本二册,“撰人不详。前五卷佚,存六至十。卷十末缀一‘终’字,余

1 (清)黄廷鉴:《校〈昆山郡志〉跋》,转引自《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二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2 (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补逸》卷一二,商务印书馆,1959年。

3 (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补逸》卷一二,商务印书馆,1959年。

4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齐乘〉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5 (清)钱大昕:《〈齐乘〉跋》,《潜研堂文集》卷二九,商务印书馆,1919年《四部丛刊初编》本。

6 (清)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研经室外集》卷一,商务印书馆,1955年。

四卷否，似全书已尽于此”¹。对于潘氏之说，著名史学家陈垣撰《书（大德）〈南海志〉残本后》指出：

潘《跋》因“卷十末有一终字，余四卷否”，遂疑“全书已尽于此”。不知卷末“终”字，或有或无，本无定例。今观此志所缺门类尚多，不能因此一字，遽谓此书止十卷。陈大震《序》作于大德八年甲辰，残本志各卷叙事亦多至大德七八年间，则称“大德刻本”，未为不合。独卷九《学校门》叙事，有至泰定元、二、三、四年及致和元年者，则显系书刻成后再印时续有增补，此亦事所常有。如果于“大德刻本”下加入“致和后续有增纂”一语，便可解决²。

三 全面认识宋元方志文献的价值

清代学者在整理宋元方志的过程当中，注重品鉴其价值，评鹭其内容与义例，论说其优点与不足，力争做出较为公允的评价，在方志评论方面取得了的不小的成绩，对清代及后世纂修方志产生了深远影响。缪荃孙充分肯定了元《河南志》的史料价值，并指出此志若与阮元所刻魏、晋四朝《洛阳宫殿图》合而观之，效果更佳：

唐朝最详，《东京城坊考》全取于此。北魏朝校以《伽蓝记》，颇有益处。周、汉、魏、晋，只能以正史、《寰宇记》校之。……觅得阮文达公所刻魏、晋四朝《洛阳宫殿图》，云出自《大典》，……实则摹从此志，阮仅以《汉晋洛阳宫城图》标题，而《宋西京图》亦附存焉。入之此志，丰城剑合矣³。

南宋（嘉定）《镇江志》是现存镇江古方志中比较完整的一部，除保存了《图经》《祥符图经》《润州类集》《京口集》等失传文献中的不少宝贵资料外，对六朝郡县脉络交代清楚，对地方官员的任职起讫年月和变动情况稽考尤详。阮元在对宋、元《镇江志》进行了详细对比后，指出两志在内容侧重上有所不同，具有互补性。由于元（至顺）《镇江志》流传较少，版本价值较高，若予以厘定校勘，则不失为一部志书佳构：

今乾道志久已失传，嘉定志尚有传抄之本，已出后人掇拾。此书体例大致取法于嘉定志，而记载详备较为过之。大约宋志主于征文，此则重于考献。宋志旁稽典籍，务核异同，此则备录故事，多详兴废。镇江在宋为边防之地，故其志攻守形势，网罗古今。在元为财赋之区，故此书物产土贡，胪陈名状。其用意各有所在，不得而同也。至于郡守参佐，宋志近征唐代，此则远溯六朝。乡贤寓公，宋志旁搜隋氏以前，此则详于两宋及元。互为补苴，不可偏废。然此书自明以来，藏书家绝无著录之者，洵为罕观之秘笈。此旧抄本编次失当，文字多舛，今重加校订缮写，俾考京口故实者得以取资也，以之抗行袁桷之志四明，殆无愧焉⁴。

1 （清）潘宗周：《宝礼堂宋本书录·元本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2 陈垣：《书（大德）〈南海志〉残本后》，《艺林丛录》第一编，香港商务印书馆，1961年。

3 （清）缪荃孙：《元〈河南志〉跋》，转引自《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三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4 （清）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研经室外集》卷一，商务印书馆，1955年。

元（至正）《重修琴川志》十五卷是常熟地区最早的古方志之一。此志创修于南宋庆元年间，初刻于嘉定年间，增补于宝祐年间，重刻于元至正年间。从志书传世的完整性而言，一般列为元志，撰者为卢镇、顾德昭等。对于此志，阮元在肯定其内容的前提下，则更加关注其稀缺性，充分体现出一个版本目录学家的远见卓识：“崇祯间……邑中邵兵部麟武得于兴福寺，仅半部，后归许文学弢美，弢美复于南都书肆购其所佚之半，始成全帙。则此书在前明已称难得，今复二百余年，宜倍珍惜也。”¹

《四库全书总目》对元于钦撰《齐乘》的内容优劣进行了详细举证，并点出了此志堪为善本的价值独特之处：“钦本齐人，援据经史，考证见闻，较诸他地志之但据舆图、凭空言以论断者，所得究多，故向来推为善本。”²

南宋乾道周淙纂修《临安志》，叙录简括，深有体要，记载详赡，于南宋地志中为最古之本，向为史家称道。《四库全书总目》对其版本价值有很高评价：“其书虽残缺不完，而于南宋地志中为最古之本，考武林掌故者，要必以是书称首焉。”³然而，对于（乾道）《临安志》，南宋文献目录学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颇有微词：“其视宋次道《东京记》，何其大不侔也，其沿革亦多疏略云云。”⁴对于陈氏的点评，清周中孚在进行了认真核实后，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

今按首卷中，当时官阙官署之类，略已备具，不知直斋何以云尔。至第二卷则为沿革、星野、风俗、馆驿等诸子目，而以亭堂楼观阁轩附之，第三卷《牧守》一门又各详其始末，直至已名而止，可谓备录无遗⁵。

南宋（嘉泰）《会稽志》二十卷，沈作宾、施宿等撰，著名诗人陆游参与纂修，并为之序。全书细目一百一十七，以类相从，叙述简赅，搜采辑比，条理井然。清代文献学家卢文弨认为其叙述客观，史料性强，具有资治的社会功用：

《临安志》尚有谄权奸、扬己绩之失，而此无有，要非施为主而佐之以陆，不能鉴裁精当若是。武子尝知余姚县，修捍海堤，此当直叙其事，使后来者可图其继，不可与自功者一视⁶。

南宋咸淳四年常州知州史能之主纂《毗陵志》，在内容上主要沿用淳熙邹补之撰《毗陵志》，是现存最早的常州地方志书。清代文学家、藏书家赵怀玉在重修时称其“体例赅备，可称良志”⁷。清代著名考据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赞誉其史表之价值，考证翔实，眉目亦清，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志书佳构：“地理沿革，非图表不显……第一卷《郡县表》，详明确实，最为当家……尤征学识之精。”⁸

1（清）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研经室外集》卷一，商务印书馆，1955年。

2（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齐乘〉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3（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临安志〉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4（清）周中孚：《〈临安志〉跋》，《郑堂读书记补逸》卷一二，商务印书馆，1959年。

5（清）周中孚：《〈临安志〉跋》，《郑堂读书记补逸》卷一二，商务印书馆，1959年。

6（清）卢文弨：《〈会稽志〉跋》，《报经堂文集》卷九，中华书局，1990年。

7（清）赵怀玉：《重刻〈毗陵志〉序》，（明）朱昱等修（成化）《重修毗陵志》，清嘉庆二十五年赵怀玉重刻本。

8（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十九《晋陵、武进》条，商务印书馆，1937年6月初版，1959年3月重印第1版。

《长安志》二十卷是宋人宋敏求所撰的宋代最著名的一部方志。《四库全书》录此书“凡城郊、官府、山川道里、津梁、邮驿以至风俗物产，宫室寺院，纤悉毕具”¹。其“考察长安古迹、城郭、宫室、山川道里、津梁、邮传，研之最详。其城市曲折，及唐时士大夫第宅所在，一一能举其处，地志中最精核者”²。是书于乾隆五十二年被毕沅编入《经训堂丛书》，王鸣盛应毕沅之请序是书称：

唐以前地志存者寥寥，宋元人作存者不下二十余种，然皆南方之书，北方惟有此志与于钦《齐乘》耳！而长安汉唐都邑所在，事迹尤多，记载尤亦加详。宋氏此编，纲条明晰，蟾而不秽，可云具体。厥后，程大昌《雍录》好发新论，穿凿支离，不及宋氏远矣³。

元（元贞）骆天骧所撰《类编长安志》十卷，是在宋敏求《长安志》基础上减繁芜、撮枢要而成的一部类书型新方志，在西安古方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其内容混乱，重复较多，为人所诟久矣。胡玉缙《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续编》云：“体例既未妥协，每类又分子目，尤为委琐，间附考订，亦失之疏略。”⁴而实际上，《类编长安志》的资料价值是极其珍贵的。如宋敏求《长安志》述长安城坊缺两坊名，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臆补为“光禄”“殖业”，而据元《类编长安志》则实当作“善和”“通化”⁵。

关于《长安志图》，元人李好文曾自述编撰初衷为“明所以图为志设”⁶。对此，清代经学家朱彝尊有较高评价，他着重强调图对于志的补充作用，这实际上也是清初学者对于方志编纂的有益探索，是比较朴素的方志学思想：

宋敏求撰《长安志》，旧有图，勒之碑，吕待制大防跋其尾。秦人取以附餒于志，谓之《长安故图》，其后亡之。夫欲周知郡县广轮之数，晰其离合，莫图若矣。……盖舍图无以准其数也⁷。

读敏求之志者，必合是编并观，而古人之迹庶几得其十九也已⁸。

清代在方志评论方面最值得称赞的当属章学诚。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人。其倡“六经皆史”之论，治经治史，皆有特色，是清代最著名的方志学家。所著《文史通义》共九卷（内篇六卷，外篇三卷），是清代著名的学术理论著作。章学诚一生的方志文论较多，然最为人所津津乐道者，实乃《书〈吴郡志〉后》一文。

南宋绍定《吴郡志》，是范成大汇辑唐陆广微《吴地记》、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等旧籍，广采史志，补充新事，于绍熙三年成书。绍定二年经汪泰亨等增订，始刊刻付印，记事亦止于该年。是志网罗文献，必载所出，取舍精审，援证明确，为地志之善本，是宋代方志体例定型化的代表作，对后世修志有很大影响，历来评价极高。

1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转引自《毕沅的方志学思想成就探析》，载《中国地方志》2012年4期。

2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七，转引自《毕沅的方志学思想成就探析》，载《中国地方志》2012年4期。

3 （清）王鸣盛：《新校正〈长安志〉序》，（宋）宋敏求《长安志》，清乾隆五十二年毕沅《经训堂丛书》刻本。

4 （清）胡玉缙：《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续编》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5 顾宏义：《金元方志考》，第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6 （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原序》，《长安志图》，（清）纪昀等纂《四库全书·史部十一·地理类十七》。

7 （清）朱彝尊：《长安志图序》，《曝书亭集》卷三五，商务印书馆，1935年影印本。

8 （清）朱彝尊：《长安志图序》，《曝书亭集》卷三五，商务印书馆，1935年影印本。

章学诚则撰有《书〈吴郡志〉后》一文，引经据典，纵横铺陈，历述范氏所著之陋，尽显评论大家风范：

文笔亦自清简，后世方志庸猥之习，彼时未开，编次亦尔雅洁。又其体制详郡而略县，自沿革、城池、职官题名之属，皆有郡而无县。县记二卷，则但记官署，间及署中亭台，或取题石记文，而无其姓名，体参差不一律。此则当日志例，与近日府志之合州县志而成者，迥不相同。……第他事详郡略县，称其体例可也。沿革有郡无县，则眉目不分矣。宜其以平江路府，冒吴郡之旧称，冠全志而不知其谬也。……今观范氏志末，亦为杂志，则前辈已先导之。其实所载，皆有门类可归，惜范氏析例之不精也。其五十卷中，官名地号之称谓非法，人氏名号之倍笔乱填。盖宋人诗话家风，大变史文格律，其无当于方志专家，史官绳尺，不待言矣。其所以为世所称，则以石湖贤而有文，又贵显于当时。而剪裁笔削，虽不合于史法，亦视近日猥滥庸妄一流，固为矫出，得名亦不偶然也。然以是为方志之佳，则不确矣¹。

当然，清代学者对范氏《吴郡志》之评论颇多，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二十亦指出其述沿革有误、牧守与进士题名有差错等。然而，能如章氏这般从内容与体例，到优点与不足，分析得精辟透彻、细致入微而成一体系者，有清一代，无出其右。

四 结 语

综上所述，清代官方修志风气浓厚，伴随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清代学者用考据家的眼光审视宋元方志，一方面，学者们注重保存传承宋元方志文献，纷纷辑佚、抄录、刻印宋元方志文献，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另一方面，他们将目光定格在宋元方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对宋元方志文献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整理与研究，涉及范围极其广泛，成果繁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深得后人称赞。部分清代学者还注重将自己的研究方式从探索和实践层面提升到认识高度，评鉴、论说宋元方志，对宋元方志在文献学和方志学的高度进行总结和分析，不仅丰富了史学研究内容，而且增益了史学研究方法，对后人的治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清代学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总之，清代学者的宋元方志文献研究成果包罗万象，成果辉煌，在整个学术领域占据重要的地位。综观本时期的宋元方志研究，其特点是以古代方志文献学的成就为核心，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编纂、考证等全面开花，硕果累累。它既是我国古代方志文献学的一个高水平的总结，也是现代方志编纂学发展的一个坚实的基点。这一时期的宝贵的方志文献遗产，尤其值得我们很好的总结和借鉴。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责任编辑：徐婉玲)

1 (清)章学诚：《书〈吴郡志〉后》，《章学诚遗书》，第131～132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